

河南宋金元明考古六十年

辛 革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市 450000)

关键词: 河南; 宋元金明; 发现与研究; 六十年

摘 要: 六十年来河南境内的宋金元明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除了介绍以往的收获之外, 重点介绍了延津沙门古渡口、叶县文集宋元遗址以及古代瓷窑址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

Key words: Henan; Song, Yuan, Ming and Qign Period;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sixty years

Abstract: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archaeology of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gn Period in Henan has obtained abundant results in discovery and study. The persent paper sums up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especially the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the Yanjin Shamen Ferry-site, the Song-Yuan Period Yexian Wenji Site and a few porcelain-makig kiln-sites.

前 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发展高峰,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为配合基本建设, 为数众多的考古工地出现在各个基建区域。在全国众多的考古发掘中, 河南地区因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历史时期中尤其是宋代, 其历史地位不容小觑。经过 60 年的艰辛工作, 北宋的都城汴梁、西京洛阳, 北宋名窑中的汝窑、钧窑, 北宋皇陵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都以实物形式印证了文字记载。这些遗迹的发现,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而且促进了这一时期的研究, 使得学术领域不断拓展, 研究体系日臻完善。囿于篇幅, 本文只能撮其要者, 概述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

一、城址及相关建筑遗址

(一) 北宋两京城址

1. 汴梁——开封

开封作为北宋王朝的帝都, 时称汴梁。由于地处平原, 深受战乱与洪水的冲击, 今人只能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

中去领略古都的繁华了。1981 年, 我所与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队, 开始了对古都汴梁的勘探发掘。

北宋汴梁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宫城为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 周长约为 2521 米, 南墙位于今午朝门东西一线, 北墙则在今龙亭大殿后墙处, 东西墙分别位于今潘、杨两湖的东、西岸。在龙亭公园南边, 探明一处大殿基址, 平面为“凸”字形, 东西宽 80 米, 南北 60 米, 四周环以宽约 10 米的夯土廊庑, 应为皇宫正殿——大庆殿所在。

内城是东京城的第二道城垣, 城内主要为商业区和居民区。其遗址位于今开封市区, 东西墙被叠压在明清城墙之下, 南墙在大南门以北一线, 北墙则在龙亭大殿以北 500 米处。内城的 10 座城门、2 座水门, 只有朱雀门和汴河西角子门的位置大致确定。

外城又称新城、罗城, 是京师的第一道屏障。它位于明清砖城外 1.3 ~ 2 千米处, 四面城墙的长度在 6940 ~ 7660 米之间, 周长为 29180 米, 与宋神宗重修都城的“城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的记载基本吻合。城

墙皆埋于地下，大多为现代建筑物所压。有城门 12 个、水门 6 个，勘探中共发现 10 处缺口，按其所处位置，应为南墙的南薰门、戴楼门和蔡河水门，东墙的可能是新曹门和汴河下水门旁的拐子门，西墙的则为新郑门、汴河上水门、固子门、万胜门和金水河门。

东京城内有 4 条河流，为汴河、金水河、五丈河及蔡河。1984 年在开封市中山路中段的市皮鞋厂前路面下 4.30 米处，发现了州桥遗址。该桥又名天汉桥，是东京城内御街上横跨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该桥为南北向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南北长 17 米，东西宽 30 米，桥面为青石板铺就，桥墩为青石条筑成，河底铺有石板，石板下衬有方木。该桥系明代在宋代州桥的基础上重修而成。

汴河，在北宋东京的位置毋庸置疑。经过数次勘探，不仅摸清了汴河的流向，还探明了虹桥的位置。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汴河东西穿过汴梁城，其上共有 13 座桥梁，最著名的除了上述的州桥，还有虹桥。该桥位于今开封市东郊屠府坟村与阎李寨村之间的惠济河北岸。其余 11 座桥也确定了大致位置^[1]。1993 ~ 1996 年，开封宋城考古队先后两次对北宋皇家园林——金明池遗址进行勘探，初步探明其大体位置与范围。金明池开凿于宋太宗年间，最初是训练水军所建的设施，后来演变为娱乐场所，每年的 3 月 1 日，皇上都会率群臣来此观看水戏表演。其热闹场面，从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中可窥一斑。金明池位于东京外城西墙外 300 米，池大致呈方形，东西长 1240 米，南北宽 1230 米，池底距地表为 12.50 ~ 13.50 米，低于当时池岸 4 ~ 5 米。随后又探明了位于金明池南岸的临水殿遗址，此处为“车驾临幸观争标赐宴”之地^[2]。

2. 西京——洛阳

北宋时期的洛阳改名为西京。由于因循

隋唐东都建制，所以就其规模而言比汴梁并不逊色。多年来考古人员先后发现了宋代夹城、宫殿基址、衙署、庭院和砖瓦窑场等遗迹。

夹城的东墙是在隋唐东都宫城西城墙的基础上加筑而成，夹城的西墙即西京的西城墙，系直接利用了隋唐外郭城的西城墙，只是在外侧加以增筑。宋代城墙的东边较隋唐城墙外扩了 5.70 米，而西墙则内收了 2.40 米，墙体夯筑，紧贴城墙外侧有一道基槽，用以包砖。

在西京宫城范围内，发现了 8 处大型夯土台基、矩形房屋和廊房建筑基址。8 处夯土台基都位于宫城的中轴线上，系用一层夯土、一层河卵石相叠筑而成。位于最南端的 1 号台基为西京宫城的第一座建筑——太极门。位于 1 号基址以北的 2 号台基为宫城内的正殿——太极殿，5、6 号基址则分别是太极门和太极殿两侧的东、西廊。3 号基址与 4 号基址依次排列，7 号、8 号台基位于 4 号台基两侧，左右对称。据考证，3 号台基应是太极殿后的天兴殿遗址^[3]。随后，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唐宫中路南侧清理了一座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地面设施已荡然无存，所幸多数础墩得以留存。推测该处遗址应为宋西京宫城的文明殿，由于它是建在唐东都的武安殿建筑群的基础之上，所以它的确立，为日后寻找文明殿群和武安殿群提供了线索^[4]。衙署遗址位于今老城区中州路南侧。1984 年发掘了门址，为单门洞砖石结构，残存有地袱石、门扉构件、车道和踏道，其结构为在地袱之上立排叉柱的“过梁式”木构门洞。在门址以北，发现有立砖砌成的大道与衙署后院相通，路东为办公的庭院，路西为园林。园林之南有两座并排的亭阁建筑面对园中池塘。紧邻池塘是一条长 16.50 米、宽 3 米的花砖路，方砖朝上一面均有柿蒂形卷草纹，该路东西两端建有南北向的廊庑，贯穿整个遗址，形成庭院的环

廊。花砖路的中部北侧还筑有一南北向的夯土漏花墙，将整所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花墙东侧有条用白色卵石铺成的小路，逶迤北去，在其北段以石子甬道与花墙西侧的黑色石子铺成的小路相连，饶有情趣。遗址中出土的脊兽、套兽、垂兽、卷草纹方砖以及菊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不少都是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园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5]。

（二）叶县文集遗址

该遗址位于叶县常村乡文集村及其西南地、汝河支流澧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遗址的东北部为新石器遗存，西南部为宋元时期遗址。2006～200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水北调主干渠占压的部分宋元时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度近2米，分属于唐宋金元明五个朝代，尤以金元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计有房基、道路、水井、窖藏坑、灰坑、灰沟、火膛和水池等遗迹，从中清理出陶、瓷、三彩、铁、铜、银、玉、石等各类遗物近2000件。宋元时期的一条道路东西横贯遗址中部，将其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他遗迹则分布于道路两旁。此路中部有一岔道，向南通往遗址南部的澧河码头。

所有房基不仅位于道路两旁，而且房门都朝向道路。就建筑方式而言有排房式、单间式和简易草棚式三种，墙体或为青砖，或为土坯，甚或夯土，从周边灰坑出有瓦片的迹象分析，有一部分房屋以瓦覆顶。发现的20多个窖藏坑以圆形居多，加工规整，有的还用火烤过，以子母坑居多，即在大坑底部再挖一小坑，坑中埋一瓷缸，可能是为了方便储存不同的物品。根据坑内所放物品，将其名为瓷器坑、铜钱坑、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坑以及奠基坑四类。

所出遗物以瓷器为大宗，多为生活用具，有碗、盘、钵、盏、瓶、灯、执壶、盆、缸等。其中又以白瓷居多，黑釉次之，

青釉与酱釉最少。比较典型的器物有瓜棱盂、葵口碗、斗笠碗、凸筋黑釉执壶、弧壁白碗、白地黑花碗和盆。（彩版一五）

发掘表明，文集遗址是一处自唐代延续到元代的民间商品交易场所，清晰明确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这一地区该时段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6]。

（三）延津沙门古黄河渡口

2006～2007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用时一年对延津县西北榆林乡的沙门城址进行发掘。该城址位于黄河故道南岸，曾是一处重要的黄河古渡口。据方志记载，宋金时期此处名宜村，为京都开封北上的水陆交通要道。金代后期，黄河改道，宜村逐渐荒废为风沙掩埋。城址大致呈北窄南宽的梯形，西、北城墙及东城墙的北段保存较为完整，东城墙南端及建在古黄河大堤上的南城墙被毁不存，在东、西及北边三面城墙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墙外约1000米应是码头所在，黄河沿西城墙蜿蜒而去。除了上述发现，还清理出道路、房基、水井、农田、灰坑和墓葬等遗迹。遗物有瓷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铜器、铁器及建筑和冶炼遗物等。经分析出土器物特征，结合文献资料，初步确定该城址为宋金时期的遗存，最晚可至元代。遗址中大量的水井、穿孔石块和品种丰富的陶瓷器，表明沙门城曾是人头攒动、商贸繁荣之地，且该城址还保留着汉代至南北朝、唐宋、金元三个历史时期的叠压关系，尤为重要是在南墙下的古黄河大堤底部的夯土层中，发现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板瓦、筒瓦及陶器等遗迹。对该城址的考古发掘，不仅是对中原地区中小城址的首次发掘，也是对古黄河渡口的第一次发掘，意义重大^[7]。（彩版一六，1、2）

（四）登封观星台元代大殿

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大元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七年（1276～1280年），许

衡、王恂、郭守敬和杨恭懿共同制定了《授时历》，并在全国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点，登封观星台就是其中之一。2003 年人们在复建观星台量天尺北的帝尧殿时，发现有砖砌房基，经过发掘，认为该基址为元代建筑，是观星台天文观测建筑的一部分^[8]。

（五）开封明代周王府遗址

1980 年代，考古工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探明了周王府萧墙和紫禁城的位置、范围以及部分门址。周王府位于今开封龙亭及其周围，其四壁直接叠压在北宋东京皇城的四壁之上，筑有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垣，以萧墙南墙外的东西大街（曹门至西门之间的大街）将明代开封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居民区和商业区，北部则为王府宫殿。经实地探测，周王府紫禁城的周长为 2520 米，已大大超出了洪武年间工部制定的王国宫城规模，加之城中的宫殿碧瓦朱门，极为奢华，为日后周王朱橚被削为庶人埋下了伏笔^[9]。

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都城，多被叠压在现代建筑之下，工作的难度很大。厘清叠压关系，找出不同时期的城址范围，利用现代探查手段和绘图技术，全面获取古代城市的考古资料，为日后开展不同城市间的比较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已成为学界共识。

二、矿冶遗址

（一）金银矿遗址

灵宝秦岭古金矿。该遗址发现于 1958 年，已勘探出古矿洞 800 余个，从洞口上的刻字得知，此处早在明代就已经开始开采金矿了，而且延续至清代。矿洞内出土铁灯、瓷碗、水桶、铁锄等生活用具，洞外则有石碾盘、石碾等加工工具。开采金矿使用的是火药爆破法，矿石的粉碎则靠利用传统的粮食加工工具和粉碎中药的工具来完成^[10]。

位于栾川的红洞沟古银矿遗址，是一处

金代和明代的古矿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矿洞、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品位很高的矿粉，还发现了 2000 平方米的冶炼遗址。当时从此矿开采和冶炼的是银矿^[11]。

桐柏围山城银矿是指银洞坡和破山东两个银矿遗址，共计有 30 多个古矿洞和开采坑，而且是就地冶炼，开采方式采用的是淬火法，开采时间约为唐宋至明清^[12]。

（二）煤矿遗址

鹤壁中新古煤矿发现于 1960 年，由矿井、巷道和 100 个采煤区组成。圆形竖井式的矿井连接 4 条巷道，巷道两侧挖有百余个灯龛，其中残留着灯盏和储油的瓷坛。采煤区分布在井口四周，就其布局而言，采煤方式极为合理，开采与排水技术也趋于成熟。从清理情况不难判断出，当年其规模较大，开采人数可达数百人之多。

1985 年人们发现了禹州神垕古煤矿，该遗址由采煤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组成。古矿井 11 座，在古巷道内当时开采的痕迹随处可见，还出土了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生活区位于古矿区的东部，地层中堆积着丰富的白底黑花瓷，器形有碗、缸、瓶和器盖等。该煤矿为宋元时期的遗存^[13]。

（三）冶铁遗址

在宋元时期的河南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冶铁遗址，经过考古调查的有安阳后堂坡遗址、林州铁炉沟遗址、南召下村遗址。其中的安阳后堂坡自汉代起就开始炼铁，宋元时期一度成为相州和林州的官营冶铁作坊。在这些遗址中，都发现有炼炉，以下村遗址的 6 号炉保存最好。该炉内径为 3.50 米，外径 6.10 米，残高 3.90 米，炉膛上部砌出一倾斜角，这一构造不仅能节省能源，而且减少了炉料对炉壁的磨损，从而延长了炼炉的寿命。由于工匠对冶炼过程中炼炉的受损有了充分的认识，故而对 6 号炉炉壁的上下部分做了不同的处理：下半部分砌筑细致严密，虽经高温而不致产生裂纹，铁水不会渗

漏;上半部则建造得粗糙。通过调查还发现这些冶炼遗址多因地制宜,如利用河卵石砌造炉壁,经济适用,多以块铁为冶炼对象,以煤作燃料,采用群炉提高产量等^[14]。

三、瓷窑遗址

(一) 汝窑的发现与研究

汝窑在宋代名窑中位居首位,它所烧制的青瓷成就了中国青瓷的最高水平。因为曾为皇宫烧制御用品,故传世品极少,尤显珍贵。

1. 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

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的是陈万里先生。他于1950年到河南调查古代窑址,前后走访了临汝、宝丰以及鲁山的9处古窑址,在随后形成的《汝窑的我见》一文中,他对清凉寺的青瓷产品给予极高评价。随后,人们陆续在宝丰清凉寺采集到天青釉的瓷片,经鉴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瓷盘的数据基本相同。

198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对该窑址进行考古发掘,随后又相继进行了七次田野发掘工作。通过清理,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瓷片、完整器物、窑具以及堆积众多御用汝瓷的宋代地层,还有烧制瓷器的窑炉、澄泥池、釉料坑及作坊等重要遗迹。历次的发掘工作,收获空前,不仅确认了汝窑烧造区的位置和范围,还发掘出了以往传世品所未见的新器类,如生活用具类的碗、盘、盆、套盒、盏托以及执壶等。在装饰方面汝瓷既注重典雅,同时也以莲纹、盘龙、双鱼和铺首衔环,以及鸳鸯、鸭和狮等雕塑来装饰器物^[15]。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掘,明确了传世汝窑瓷器的产地,窑炉作坊以及窑具的发现,为人们研究汝瓷的生产技术提供了线索和实物依据。而该窑的在北宋早期为民窑,生产大众化的生活用品。到了

北宋晚期,汝窑的集中生产、陶泥为范、满釉支烧、瘞埋次品等做法则有别于民窑,使其具有了中央官窑的性质^[16]。

2. 汝州张公巷瓷窑遗址

在河南地区烧制同类青瓷的窑口还有汝州张公巷窑。

张公巷窑址位于今汝州市区东部偏南。该窑址发现于2000年,同年春和2001年夏,我所先后对该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在不大发掘范围内,共清理出房基、灰坑以及一些类似汝瓷瓷片和窑具等遗存。消息一经公布,引起多方关注。2004年我所又对张公巷窑址进行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此次发掘清理出了房基、水井、灶、灰坑等遗迹,出土了一大批产自该窑的青釉瓷片。这批青釉瓷既不同于汝州严和店窑的青瓷,又有别于宝丰清凉寺窑的豆青釉和天青釉,它们为淡青、青绿、灰青、卵青,以薄胎薄釉为主,釉面玻璃质感强,胎质细腻坚实,色泽为粉白、灰白以及洁白。器形有花口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葵口平底盘、椭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盏托、瓜棱瓶以及堆塑熏炉等。素烧器底多有规整的米粒状支钉痕,支钉数量多为三、四、五。窑具以匣钵、垫饼和垫圈为主。从目前的发掘材料看,张公巷窑的产品虽与汝窑接近,但整体上不及汝窑。其极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汝、钧、官、哥、定”中的官窑^[17]。

3. 其他窑址

除了上述窑址之外,还有邓州窑、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关窑。

邓州窑位于今内乡县大窑店,在20世纪人们就已经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18]。该遗址出土的青瓷碗多为高窄圈足,印花,碗外壁多刻荷叶叶筋纹,印花碗的花纹凸起较高,用手触摸凹凸感明显。重要的是在一件采集的青瓷表面,刻有“窑司”铭文,这是主管窑务的窑司对该窑进行监烧的实证。

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关窑均是制瓷水平较高的窑口,产品以青釉为主,兼烧白釉、黑釉、宋三彩和白地黑花瓷^[19]。城关窑的青瓷器,胎质细腻致密,施釉均匀莹润,少见流釉现象。在装饰方面,有刻花、划花和印花,题材有缠枝、折枝和交枝等花卉图案,还有鸳鸯戏莲、海水游鱼、海螺水浪等纹饰,图案布局严谨,注重装饰效果。宜阳西关窑的产品施釉稍厚,纹饰以印花为主,大多为突起的阳文,常见缠枝、折枝和交枝花卉,构图优美的牡丹、菊花最具特色。有资料表明,该窑的繁荣阶段应该是在北宋中晚期。

由于近年来有关瓷窑址的新资料陆续刊发,不仅丰富了原有的认识,同时也大大激发了研究者的热情,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研究窑口的性质和器物类型,还利用科技手段对各个窑口的产品进行多方位的分析,以期加深在瓷器研究领域的深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香港城市大学物理及材料科学学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利用多种现代科学方法,分别对汝瓷的成分、微观结构乃至汝瓷的产地进行科学分析,取得了初步成果。

通过利用能量色散 X 射线探针,研究者搞清了汝瓷在烧造过程中胎釉之间的玻璃态变化以及胎釉成分。同时,通过对汝窑瓷器的微量元素进行测试,使之与杭州老虎洞窑的宋元时期的产品区别开来,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考古学研究^[20]。

相对于地理位置较近的另一名窑产品——钧瓷,民间素有“钧汝不分”的说法,这是因为相邻的位置,两地的成矿背景接近,使得两个窑口的原料成分相近,造成两窑瓷器中有部分器物的器形和釉色看上去很相似。为解决这一难题,人们利用质子激发 X 射线荧光分析技术,测量两窑不同釉色样品的主要化学成分,认为钧窑产品的原料产

地比较集中,而汝瓷胎的产地则分散些等重要信息^[21]。

(二) 钧窑的发现与研究

1960 年代,人们在今禹州市内的钧台和八卦洞附近发现一处钧窑遗址,由此引起了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1973 ~ 1975 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前后 4 次对该处窑址进行发掘,弄清了窑址的大小、分布范围,获取了大批不同窑口的瓷片标本,使得人们对钧窑有了全新的认识^[22]。2001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对禹州神垕再次进行田野发掘。发掘重点是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发掘面积 650 平方米,发现窑炉遗迹 8 座,石砌澄泥池 3 座,还有灶及窑前工作场,出土大批瓷器和窑具。由于发掘意义重大,故而此项发掘被评为 200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通过初步整理,发掘者认为钧窑兴起于北宋末年,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部分产品仿制汝窑。在其早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与天青釉汝瓷的生产并行的。其后虽仍有生产,但因战乱和政治中心南迁等诸多原因,钧窑的产量虽大,但产品明显没有第一期前段精致高端了^[23]。

2004 年,为配合基建,我所于同年的 4 ~ 9 月间对原禹州制药厂所在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窑炉、灰坑、水井、房基等遗迹,其中以 H1 的内涵最为丰富。坑内遗物以瓷器为大宗,有钧瓷、豆青瓷、黑釉瓷、黄釉瓷、孔雀蓝釉瓷以及宋三彩,其中钧瓷器形有出戟尊、鼓钉洗、高柄碗、单把洗、花盆、盆托等器物,在花盆和出戟尊的底部刻有“二”至“十”的数字。同时还发现了匣钵、垫饼和支钉等窑具。经过初步整理,发掘者认为 H1 的年代应为元代^[24]。

2005 年为配合地方建设,我所对汝州大峪乡东沟窑址进行发掘。清理出窑炉、水井、灰坑和护墙等遗迹,出土大批青瓷、钧

瓷、素烧器残片以及匣钵、垫饼和垫圈。瓷器的器形以碗、盘、盏、罐、盒、器盖、炉和枕为主。通过对发掘材料的整理,发掘者将东沟窑址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金代、金末元初以及元代,该窑前期以烧制青釉瓷为主,兼烧钧瓷,皆满釉支烧且釉色均匀。后期则青瓷减少,钧瓷逐渐增多,器形单一,釉面浑浊,以半釉为多,均为垫烧。东沟窑址的发现,为研究青釉瓷和钧瓷之间的关系,以及金元时期青瓷、钧瓷的断代提供了新资料^[25]。

(三) 磁州窑

河南地区属于该窑系的有修武当阳峪窑、禹州扒村窑、新密窑沟窑和鹤壁集窑。现择其要着,简介如下。

当阳峪瓷窑址位于修武县城西北 22 千米。2003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水井、过滤池和灶等遗迹。在一孔保存较好的窑洞式作坊里发现有用于晾晒器物胚胎的设备,70 余个灰坑更是出土了大量的器物。根据地层堆积判断,这一窑址的年代可划分为宋、金和元代。以宋代的细白瓷、三彩器和酱釉瓷为主,金元则以粗白瓷和白地黑花瓷为其主要堆积,钧瓷主要出土于元代地层中。这次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白釉瓷和绞胎器,尤为重要的是相当数量的酱釉瓷的发现,表明当阳峪窑至少在宋代晚期就已成功仿制定窑器物,这种细白胎的酱釉瓷,体轻且薄,釉面光亮,十分精美,展现出当时工艺技术已是炉火纯青,并改变了以往当阳峪瓷窑不生产“紫定”的认识^[26]。(彩版一六,3)

禹州扒村窑的器物表面普遍使用化妆土,釉面黑白分明,色调明快。其装饰以折枝花草纹为主,人物花鸟也较为常见,纹样构图细密,笔画流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27]。

新密窑沟窑的白底黑花瓷以对称的花卉

图案最具特色,瓷枕上常为“童子扑蝶”的画面,极富生活情趣^[28]。

鹤壁集窑兴于晚唐,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烧制钧瓷和磁州窑系产品。品种丰富,白釉刻花瓷笔画流畅,黑釉瓷釉面漆黑发亮,白底黑花瓷线条简洁,充分显示出鹤壁集窑的制瓷工艺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四、墓 葬

(一) 北宋皇陵及其陪葬墓

在巩义市西南的丘陵上,分布着北宋九帝中的七帝外加赵匡胤之父的“七帝八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 1992 ~ 1995 年的考古调查,基本弄清了北宋皇陵的布局与结构。皇陵分布于四个陵区之中,除了帝陵之外,还祔葬有后陵和宗室子孙的墓葬,其规模宏大,陵园建筑基址和石雕群像保存较好,体现了宋代陵寝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寝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9]。西村陵区在常封村与滹沱村之间,该陵区包括宋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以及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三陵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在它们的西北部,祔葬有后陵 10 座,宗室子孙墓 140 余座。

蔡庄陵区位于芝田镇蔡庄村北的高地上,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及其刘后、李后和杨后陵分布于此。

孝义陵区位于巩义市南,这里有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和英宗赵曙的永厚陵,二陵东西并列。永昭陵祔葬有曹皇后陵,永厚陵祔葬高皇后陵。

八陵陵区位于芝田镇八陵村南,分布着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永裕陵西北祔葬着神宗向皇后、朱皇后、陈皇后和徽宗王皇后等 4 座后陵,永泰陵西北则祔葬有哲宗刘皇后陵。

各陵园建制相同,均由上宫、下宫、后陵和陪葬墓组成。南神门外为神道,两旁对称排列着石雕群像,其尽头设置有乳台,

陵园的南端为鹤台。

北宋皇陵的陵园布局，大致沿袭自唐代陵寝制度，但与之不同的是北宋的陵园规模和石雕像数目整齐划一，且受风水堪舆影响很大，崇信“五音姓利说”，不再遵循依山为陵之制，使得诸陵在地势上南高北低，即由鹤台向陵台逐渐倾斜，而且有些陵墓或囿于地势、或循于姓利说所择地点过于狭促而使兆域呈缩小之势，使得陵墓更像一组殿堂，开启明清的“方城明楼”之制^[30]。

经过发掘永昭陵上宫的地面建筑基址，发现鹤台、乳台、门阙和角阙均为夯土筑成，外面包以砖，四周神墙为黄土夯筑，表面粉以红灰^[31]。

后陵多位于帝陵陵园的西北隅，平面布局与帝陵相似，只是陵园面积较小，石雕像的数量也减少一半。陪葬墓位于后陵的北部和西北部，每墓自成茔园，在封土规模、面积大小以及石雕像数目等方面也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经过发掘的太宗赵光义的元德李皇后陵，解开了宋代皇陵地宫的秘密。元德李后为太宗之妃、真宗赵恒之生母，薨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真宗即位后，至道三年（997年）5月被迫封为贤妃，继而又追尊为皇太后，咸平三年（1000年）按皇太后礼仪迁葬于太宗永熙陵之西北隅。李后陵陵园保存较好，地面存有陵台和部分阙台基址，以及30件神道石雕像。

地宫位于陵台正下方，为单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陵台南部正中，全长34米，南段为斜坡状，有土台阶可供上下，墓道北端与甬道底部持平。青石质的墓门表面磨光，门额上线刻两身飞天，四周环以祥云，两扇门扉上各刻一高大威猛的武士，呈站姿，浓眉环目，披甲持锐，威风凛凛。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为7.90米，穹窿顶，高12.26米。石砌的棺床位于墓室北半部，其南面做成须弥座式，

于其上装饰花纹。有10根砖砌立柱将墓壁分隔为十一个区域，在这些墓壁上都用砖雕凿出桌椅、灯檠、衣架以及门窗等图案。在阑额之上，用砖砌出斗拱等仿木构建筑，其中在斗拱的表面还残留有红白二色。墓顶则绘有星象图。

该墓虽曾被盗，但仍出土了玉、瓷、石、铜、铁以及木质随葬品181件。有玉谥册、玉哀册各一幅，带文字的建筑构件、彩绘木雕龙首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细瓷。青釉瓷胎质坚浅灰硬，釉色光洁，制作规整，工艺精湛，器形有碗、盘和盒。曲腹盘器形较大，内底刻划出一条蜷曲的龙纹，造型飘逸，遒劲有力。云鹤纹套盒为四层相套，划纹纤细匀称，应为越窑所产的“秘色瓷”，堪称精品。定窑“官”字款白瓷有17件，釉色泛白或白中闪青，胎质细密坚实，釉面光洁细腻，器形有碗和盘，在一些器物的圈足内阴刻有“官”字款。纹饰多为划花，以飞凤纹最为常见。发掘者还在陵台的外围找到了当初建造陵墓时的长方形墓口，从这里入手，大致推测出了陵墓的建造方式^[32]。经过实地踏查，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市南部青萝山的南横岭南麓，找到了宋陵石雕像的原料采集地。此处距宋陵的直线距离约25千米，在采石场内随处可见人工开凿的痕迹，山壁上的采石面和采石坑，已凿出眼鼻轮廓的废石料，以及山崖上镌刻着与宋陵有关的题记，均可证明此处就是宋陵采石场^[33]。

宋陵的陪葬墓逾千座，经过考古发掘的有周王赵玄祐墓、魏王赵颢墓以及燕王赵颢墓。

周王墓位于巩义市芝田镇芝田村南，据墓志可知，墓主为真宗第二个儿子赵玄祐，是至道元年（995年）十一月生人，卒于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仅活了九岁，于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祔葬于太宗永熙陵。斜坡阶梯状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北部与

甬道相接。甬道内壁敷有一层草拌泥,其上再粉以青灰。在甬道的南半部两旁各掏有一个砖砌壁龛,龛内壁敷草拌泥和青灰,底部铺砖。青石质的墓门,表面磨光,两扇石门上各刻一高大的武士线刻像,高2.80米,几欲与门等高。武士头簪花,全身披甲,持剑挺立,气宇轩昂。墓室为圆形单室砖券墓,穹窿顶。棺床位于墓室北部,系砖砌出,为须弥座式。墓室内壁用砖砌出仿木构建筑的倚柱、阑额以及斗拱,除西侧南部靠近甬道的一面室壁无雕砖外,其余七个壁面分别用砖砌出桌椅、灯檠、衣架、隔扇以及门窗等图案。

该墓曾多次被盗,所出随葬品有石墓志一合,志盖上阴刻“大宋故周王墓志铭”八字,还有石刻宫人头像及砖瓦等建筑构件。另外在填土中还发现了瓷片,其中包括钧釉瓷、白瓷、白地黑花瓷以及越窑青瓷等,器形有碗、碟和盏托^[34]。

燕王赵颢和魏王赵颢分别为英宗第二子和第四子,两墓均位于英宗永厚陵西北。魏王墓于1961年被发现,形制与元德李后陵相同,由斜坡墓道、甬道、墓门和圆形墓室组成。墓道长13.50米,宽5.52米。墓门砖券,高2.36米,门额上砌出斗拱并涂朱。甬道砖砌拱顶。墓室平面为圆形,石板铺底,不见棺床,穹窿顶。因被盗,仅发现两方墓志、一件“魏王告匣”石盖和数件青、白釉瓷片。《宋皇叔故魏王墓志铭》和《宋皇叔益端献王妻魏越国夫人墓志铭》记录了魏王及夫人生平和埋葬经过^[35]。

1985年发现并清理了燕王墓。该墓与魏王墓在形制上的区别在于墓室中的葬具。在直径为8米的圆形墓室中部挖一方坑,内砌石椁,椁盖用14块石条铺成,其上自铭“寿堂”,椁内用两根石柱分隔成了前后室。该墓仅存一合墓志和残碎的瓷片。所出墓志盖正中篆书《宋皇叔故燕王墓志铭》,它在众多同时代的墓志里形制最大,边长达

1.37米,字数更是有2500个之多。瓷片以定窑白瓷居多,胎薄质坚,釉色纯净,在一件白瓷碗残片上贴有金花,现存定窑瓷器中仅此一例。该木结构独特,墓室分为上下两层,为研究宋代陵寝制度提供了新资料^[36]。

2010年春,为配合郑西高速客运专线,我所在巩义市回郭镇清中村发掘了10余座古代墓葬,因其位于宋陵的边缘,所以不排除其中就有宋陵陪葬墓的可能^[37]。

(二) 明代藩王墓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曾大肆分封他的儿子为亲王,后任者也相继为之。终明一朝,共封亲王60余个,仅就藩于河南地区的就有开封周王、卫辉潞王、洛阳伊王和福王、南阳唐王等。经过勘察和发掘的有周定王墓、潞简王及次妃墓、周定王七世孙朱朝埵墓、福王家族墓。因为明皇陵只发掘过定陵,所以研究藩王陵的重要性自不言待。

周定王朱橚,为明太祖第五子,卒于洪熙元年(1425年),葬于禹州后营老官山,地面建筑不详,其墓室系劈山凿洞而成,砖石砌筑,距地表约10米,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其中两主室各带4个耳室。甬道后为两扇石门。前室左右各有2个耳室,进深10.23米,各带石门。前室之后升八级台阶,通过石门进入后室。后室宽25.7米,纵深9.57米,高15米,棺床位于中央,后壁并列4个耳室^[38]。

潞简王朱翊镠是明穆宗的第四子、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葬于新乡西北的凤凰山南麓。陵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边的为朱翊镠墓,西边的则是其次妃赵氏墓,两墓均坐北朝南,建筑布局大体相同,共占地11万平方米。潞简王墓的地面建筑前一部分为神道,由“潞藩佳城”的石牌坊为前导,狮子、狻猊、麒麟、骆驼、象、羊、马、变形怪兽和文吏等组成的石刻仪仗16对分列两旁。坟墙原有内外两重,可惜内墙破败不

堪。坟墙为青石条砌成，高 6 米。园内为三进院落，第一进院内有“维岳降灵”石坊，第二进院的门楼面阔五间，进深一间，享殿已毁，只余台基。后院明楼已不存，立于宝城前的“敕封潞简王之墓”的龙首碑尚存。墓室位于“宝城”之下，青石条砌成，拱券式，由甬道、前室、左右耳室和后室组成。前室设有长方形石几筵，后室正中为棺床。随葬有墓志一合。赵氏墓的形制结构大抵与朱翊镠墓相同，但其前后两室的面积均大于朱翊镠墓，甬道长约 16 米，宽 3.60 米，前起隧道券，高大宽敞，已近似于定陵的墓葬形制，只是在等级上有所降低^[39]。两墓被盗一空，仅在墓道口处出土了玉器、金器、瓷器和铜钱等遗物。

2006 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工作者在新乡潞王坟乡老道井发掘清理了一座明代墓葬，编号为 101 号墓。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石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前室、耳室和后室组成。长方形墓道长 15 米，连接墓道和前室的是一道由 5 块青条石叠压而成的封门石。前室呈长方形，东西两侧各有一形制相同的耳室，耳室与前室均由两扇石门相通。通过前室北边的两扇石门，进入长方形后室，其底部略高于前室，中央设立棺床，外砌青石，内侧砌砖，棺床上未见葬具，但根据后室所出铁质棺钉及绘有金色花纹的红色漆皮推测，应有木质葬具置于棺床之上。由于多次被盗，101 号墓的随葬品极少，为陶棋、瓷缸、玉带板以及 80 余枚铜钱。从墓葬形制等方面判断，该墓墓主应为潞简王的天子之一，其下葬年代在 1590 ~ 1607 年之间^[40]。

朱朝瑜为周定王的嫡孙、第六世原武王，死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他和原配张太妃的合葬墓位于荥阳瓦屋孙村东南，为砖砌的单室墓，该墓的特色是墓室内有大量的佛教题材的壁画，构图严谨，颇具艺术价值。墓室正中有放置棺木的石棺床，其正

面雕刻有花纹。墓室除南壁外，其余壁面均绘有彩色壁画。北壁正中绘释迦佛立像，在其左右各画四只护法神禽，其下为波浪纹。东壁是释迦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背光中绘出男女墓主人及亡故亲友五人，佛像两旁是菩萨罗汉，上方为祥云、殿堂、楼阁以及仙鹤。西壁的壁画与东壁相同，唯释迦佛是合掌而坐。墓顶绘以日月星辰，以表示天空。墓中仅存石墓志两合，分别为《明册封周藩原武温穆王圻志铭》和《明册封周藩原武温穆王原配张太妃合葬圻志铭》^[41]。

明福王家族墓位于洛阳市东花坛附近，三座墓呈“品”字形排列。三座墓的结构相同，均由墓道、石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砖券顶，棺床位于墓室正中央，四周或用石板、或用大砖围护砌成。残余的随葬品有金质压胜钱、银币、陶灯、铁饰和铜钱。在一块刻铭砖上楷书着“大明崇祯三年三月廿二日，福府瓦匠孙尚喜、张嘉猷、孙尚进、周天梁”字样。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第三子，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之藩洛阳，这三座墓的发现，为探寻福王墓提供了线索^[42]。

1986 年，在沁阳市东北九峰山下的张波村的朱载堉墓前，发现了朱载堉墓志碑残石，碑文为大书法家王铎书写，字体雄健有力，从残存的碑文可知朱载堉于万历四十年（1612 年）下葬，为研究朱载堉的生平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朱载堉是太祖的九世孙、郑恭王厚烷之子，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他在舞蹈、音乐、物理和历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他创立的“十二平均律”，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43]。

2006 年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当地的基本建设，在南阳市人民路北段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从出土墓志得悉，该墓墓主为第三代唐王朱琼烜的第五子朱芝垠与其妃宋氏，朱芝垠卒于正德十五年（1520 年）。除封门和墓门顶部用砖外，其余均为石条砌筑。该墓

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斜坡状墓道长 5.05 米，朝南，墓室大致呈方形，由于在中央位置有一道隔墙将其分割成大小相等的两个墓室，所以该墓的墓门是由三根立柱、四扇门扉、两门楣以及两门槛组成，门楣石上用砖砌出女儿墙，于其上砌出两个券状壁龛，墓志就放在龛里。东西墓室长 3.90 米，宽 1.80 米，内高 1.70 米，东西北三壁、墓底及隔墙均为长条石砌铺而成。由于被盗，该墓只出土了两方墓志、铜钱两枚以及一把铁锁。两合墓志均为青石质，出土时志盖与志身相扣合并被两道铁箍相束，志盖上分别书有“唐府承休荣和王圻志”、“唐府承休荣和王妃宋氏之墓”。南阳为唐王之藩，先后共历九世十二王。承休荣和王墓是迄今唯一一所经过发掘的明代唐藩墓，具有重要价值^[44]。

（三）其他墓葬

为了体现亡者的地位和身份与普通人的不同，宋代墓葬的形制表现各异。

石室墓在墓葬规格上较高，为权重者所用。目前能够看到河南地区的发掘材料的只有密县五虎庙冯京墓^[45]和伊川窑底村王拱辰墓^[46]。冯京官至枢密副使，王拱辰为彰德节度使，这批资料对研究北宋丧葬制度极为有益。

宋代的砖室墓是宋墓里的重头戏，它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极其丰富。砖室墓又可分为砖券墓和仿木结构两类。前者发现较少，以方城县盐店村和金汤寨的范致虚家族墓^[47]、郟县茨芭村苏仲南墓^[48]为其代表。

而砖室墓中的仿木结构的宋墓最具特色。它发展演变自成序列，墓室平面由圆形或方形发展为六角或八角形，由单室发展至前后两室，从象征性的角柱仅承托“一斗三升”演变为五铺做重栱，墓顶也由叠涩顶发展为宝盖式盪顶藻井。室内多以雕砖和壁画为装饰，内容涉及建筑构件、生活用具、杂剧、宴饮、庖厨、散乐、供物纳财及

墓主人画像等多方面。郑州南关外至和三年（1056 年）胡进墓、安阳天禧镇熙宁十年（1077 年）王用墓、禹州白沙元符二年（1099 年）赵大翁墓、安阳新安庄大观三年（1109 年）王现墓、新安李村靖康元年（1126 年）等五座纪年墓，直观地反映出北宋时期仿木结构墓葬的演变轨迹^[49]。1957 年出版的《白沙宋墓》报道了禹州白沙宋墓，即一号（赵大翁墓）、二号和三号墓。此书全面报道了这三座墓的发掘资料，通过“墓室结构的特点和墓室壁画的内容，结合丰富的历史典籍考证和再现宋代的社会生活”^[50]。作者用文献考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墓葬为载体，将宋代的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及风俗等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典范，历久不衰。

宋代在我国古典戏曲史中举足轻重，开始出现了以演绎故事为主的“古剧”，即两宋谓之杂剧。剧中角色分工不同，扮相也就有所区别，有关具体形象早已无从稽考。然而这一切随着一批包括白沙宋墓在内的宋代墓葬的出现得到改变。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了 3 块杂剧雕砖，第一块雕砖雕一人，手持立轴，面向观众，这是“引首”，表示剧目的开始；第二块砖上二人正在对话，为“正杂剧”；第三块则雕有表情夸张的二人，是为“杂扮”，表示剧终^[51]。温县东南王村宋墓墓壁上镶嵌散乐图和杂剧图各一幅^[52]，洛宁介村宋墓出土雕砖 21 块，是宋墓中所见杂剧雕砖数目最多者。其中单人演出的雕砖 13 块，表现双人演出的则有 8 块。对这些雕砖所见内容，人们依据文献记载，考据出现在画面中的表演形式、角色行当以及乐器名称^[53]。此外，以荥阳司村宋墓^[54]、嵩县北元村宋墓^[55]、林州李家池宋墓^[56]等为代表的一批宋墓，其壁画内容为孝子图，并于其旁墨书“××行孝”。有的宋墓将孝子图刻在石棺上，如孟津张盘村宋崇宁五年

(1106 年) 张君石棺^[57]、巩义西村宋宣和七年(1125 年) 王二翁石棺^[58]等, 所发现的相关材料层出不穷, 由此引发了学者对《二十四孝》内容的演变及其影响的探讨与阐释^[59]。

2008 年, 在洛阳市西工区史家屯村北, 发现了一批宋代墓葬。通过清理, 共计 11 座, 其中 8 座墓葬都出土了墓志, 表明这批墓葬为北宋晚期富弼家族墓。由于被盗, 除出土 14 方墓志之外, 仅在个别墓葬中发现有瓷瓶、陶罐、铁牛、铁猪和铜钱等少量遗物^[60]。有关这批墓葬的详情, 尚待发掘资料的进一步整理。

土洞墓主要分布于豫西, 均为竖穴墓道, 墓室横列。较为独特的是其中一些土洞墓的墓壁上或多或少地浮雕出门窗及花卉图案, 这种用土壁做材质于其上雕刻图案的做法为别处不见, 或许是一种地域性差异的表现^[61]。

处于墓葬等级最底层的是竖穴土坑墓。其中之一种类型就是“漏泽园”, 即为官办的坟场, 将无人认领的遗骸、军人、老人、罪人及外地人的尸体, 由政府出资集中安葬于规定的区域。由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编著的《北宋陕州漏泽园》一书, 对这一遗存作了系统而详实地介绍和研究^[62]。还有一类竖穴土坑墓单人葬和合葬并存, 有木棺葬具和随葬品^[63]。

在河南地区发现的金元墓葬为数不多。

目前能够判定属于金墓的主要依据是墓碑或刻铭。这些墓葬分布于鹿邑、焦作、辉县、义马等地, 另外在武陟、禹州、登封和洛阳, 也发现了金代墓葬。上述资料显示, 这些金墓皆为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 墓室平面为八角形或长方形, 墓壁用雕砖与壁画装饰, 图案为仿木结构、门窗、灯檠、人物、花卉、仙鹤以及行孝图。焦作的金代承安四年(1199 年) 邹瓊墓, 为一座画像石墓, 平面为不规则的八角形, 壁面上刻出戏剧、

墓主人生活和行孝图, 其中的戏曲演出尚有乐队在两侧伴奏, 场面实属罕见^[64]。除了仿木构墓, 还发现有土洞墓。孟津麻屯金天德二年(1150 年) 墓为单室土洞墓, 墓道北端凿一天井, 墓室平面为长方形, 墓底铺砖, 在墓室四角各放置河卵石一块, 出土有陶质买地券^[65]。

目前所披露的元代墓葬有伊川元东村的 4 号墓和 5 号墓^[66]。这两座墓葬平面分别为八角形和长方形, 均为砖石墓, 且不见了流行于宋金的仿木构雕砖形制。5 号墓的四壁及墓顶都会有壁画, 内容为墓主人对坐图、礼乐供奉图, 墓门两旁各绘一门吏, 墓顶则为牡丹、祥云及仙鹤。所绘人物个性鲜明, 有的身着蒙古族服饰, 为这座墓葬的断代提供了信息。洛阳王述墓的年代为至正九年(1349 年), 墓主为蒙元朝中一名官吏, 所出 40 余件随葬品一并搁置在方形墓室东侧的长方形空心砖上, 除一件为瓷碗外, 其余随葬品均为陶质, 其中有 20 余件仿铜礼器, 器形有鼎、敦、壘、尊和爵^[67]。

近年来, 通过考古者的辛勤工作, 陆续发现了一批明代纪年墓, 它们的发现, 为人们研究明代丧葬制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这些墓葬是南阳的陈周·姚真石氏墓、孙通墓、潘麒墓、黄璋墓、邵相墓、史羨墓、张珠墓以及一批唐藩内侍墓^[68]。其中除陈周·姚真石氏墓和潘麒墓为砖石墓外, 余者均为竖穴土坑墓, 个别墓底铺砖。在墓葬形制方面, 方形墓多为合葬的双室墓、三室墓, 内侍墓则为单室墓。这批唐府内侍墓的发现,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明朝藩王内侍丧葬的资讯, 他们百年后不得入祖坟, 而是被集中安葬于麒麟岗某个竖穴土坑墓中, 若有亲属, 则由亲属为其善后, 否则, 就由亡者的手下将其安葬。

南阳市的明代墓葬还有倪氏家族墓、柴氏家族墓、刘氏家族墓、郭氏家族墓、陈氏家族墓和赵氏家族墓。在这些墓葬中, 倪海

墓规格较高,坐北朝南,是一座“甲”字形砖石墓,墓门拱形起券,门外用五块石条上下叠压封门。甬道砖铺底,与墓室相连。墓室为方形,墓壁及墓底均用规格相同的青灰砖铺砌,墓顶起券,墓室后壁正中掏挖一壁龛,墓室后端中间为砖砌棺床,其上平铺一层草木灰。墓葬被盗一空,仅余一方墓志。虽然被盗严重,但这批资料仍旧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墓主身份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实证,并且因为均有墓志出土,为明代墓葬的排比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一历史时期,尚有佛教考古遗迹等多例考古发现,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

五、余 论

纵观已刊发的考古资料不难发现,相比数量庞大的宋墓,金元墓葬显得异常稀少,排除战乱等外在因素,研究者自身是否具备了足够的课题意识?如果过分依赖文献和文字资料,考古学在复原重建古代社会历史方面的特殊作用将会被忽视,遑论构建考古学的框架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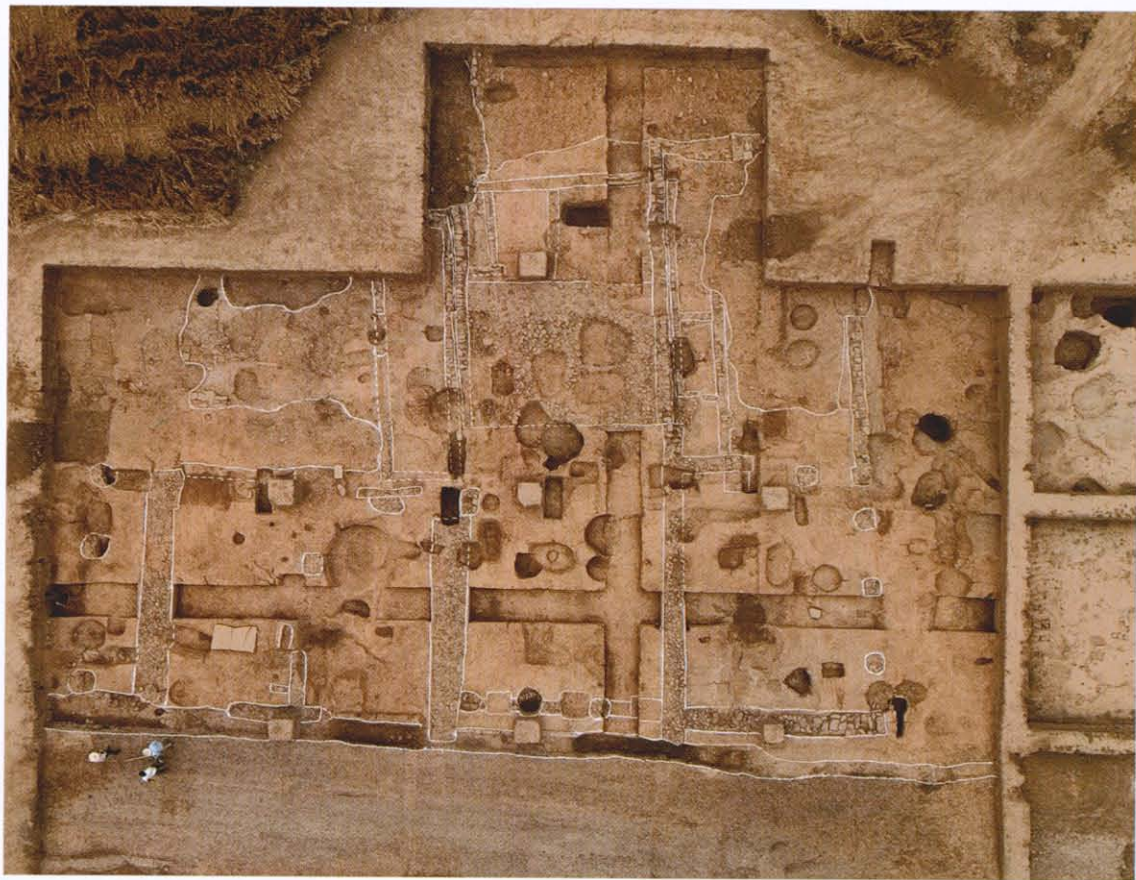
勘探与试掘.文物,2005,(9)。

- [1]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开封市宋东京城内汴河故道的初步勘探与试掘.考古,1999,(3)。
- [2] 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676~680.
- [3] 同[2]:680~68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市唐宫中路宋代大型殿址的发掘.考古,1999,(3)。
- [5] 同[2]:680~682
- [6] 王龙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文集遗址.见:国家文物局主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47~149.
- [7] 刘海旺等.河南延津沙门古黄河渡口城址.见:国家文物局主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54~159.
- [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观星台元代大殿基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4)。
- [9]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开封明周王府遗址的初步

- [10] 同[2]:684.
- [11] 同[2]。
- [12] 同[2]:684.
- [13] 同[2]:685.
- [14] 同[2]:683.
-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16] a. 小林仁.“澄泥为范”说汝窑.故宫院刊,2010,(5)。
b. 王光尧.汝窑与北宋汴京官窑——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北宋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故宫院刊,2010,(5)。
- [17] 郭木森.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73~178.
-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内乡大窑店瓷窑遗址的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19] 孙新民.宋金元明时代·著名瓷窑遗址.见: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687
- [20] 同[15]:161,174,188.
- [21] 同[15]:224.
- [2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台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23] 秦大树,赵文军.钧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7~38.
- [24] 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44~50.
-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2)。
- [26] 赵志文.千件宋瓷惊现当阳峪.文物天地,2005,(7)。
- [27] 孙新民.宋金元明时代·著名瓷窑遗址.见: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689.
- [28] 孙新民.宋金元明时代·著名瓷窑遗址.见: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689.
-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30] 秦大树.《北宋皇陵》评介.文物,1998,(7).
- [31] 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692.
-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308~325.
- [33] 同[32]:693,694.
- [34] 赵文军等.宋陵周王墓.见:国家文物局编.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66~168.
- [35] 同[2]:696.
- [36] 同[2]:696.
- [37] 正式发掘报告未刊发.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考古年报(2010).
- [38] 刘毅.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研究.华夏考古,2010,(3).
- [39] a. 同[38].
b. 杨爱国.明代亲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增刊).
- [40]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新乡市老道井明代101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3).
- [41] 同[2]:710.
- [42] 同[2]:710.
- [43] 同[2]:711.
- [44]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阳明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89~93.
- [4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4).
- [46] 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中原文物,1985,(4).
- [47] a.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11).
b.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金汤寨宋范致祥墓.文物,1988,(11).
- [48] 李绍连.宋苏适墓及其他.文物,1973,(7).
- [49] 同[2]:699.
- [50]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51] 董祥.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文物,1959,(9).
- [52] 张思青,武永政.温县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1).
- [53] a. 徐苹芳.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5).
b. 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9).
c. 李献奇,王兴起.洛宁县宋代杂剧雕砖试析.中原文物,1988,(4).
d. 廖奔,杨建民.河南洛宁上村宋金社火杂剧雕砖叙考.文物,1989,(2).
- [54] 郑州市博物馆.荥阳司村宋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4).
- [55]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嵩县北元村宋代壁画墓.中原文物,1987,(3).
- [56] 林州市文物保管所.河南林州市李家池宋代壁画墓.华夏考古,2010,(4).
- [57] 黄明兰,宫大中.洛阳北宋张君墓画像石棺.文物,1984,(7).
- [58] 巩县文物保管所,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巩县西村宋代石棺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8,(1).
- [59] 董新林.北宋金元墓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与高丽《孝行录》.华夏考古,2009,(2).
- [60] 史家珍等.洛阳北宋富弼家族墓.见:国家文物局编.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46,147.
- [61]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北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2).
- [62]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北宋陕州漏泽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63] a.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新乡县丁固城墓地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5,(2).
b. 于晓兴.郑州出土宋代三彩狮子枕.中原文物,1986,(4).
c.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外发现一座宋墓.文物,1965,(8).
- [64]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8).
- [6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县麻屯镇金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1).
- [66]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5).
- [67] 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元王述墓清理记.考古,1979,(6).
- [68] 同[44].

(责任编辑:方燕明)



1.叶县文集金元遗址发掘现场



2.叶县文集T1906J6



3.叶县文集金代地洞式器物窖藏坑



1. 延津沙门古代农田遗迹 (T39055)



2. 延津沙门古城墙南段北中部夯窝 (T67054)



3. 修武当阳峪窑址Ⅱ区Y6